

#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论创新、议题拓展 与共同体建设

高奇琦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计算政治学是政治学主动响应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学科自觉, 其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 新方法论的引入、工程能力和工程思维的构建以及传统政治学方法的再创新。计算政治学不仅强调“用计算赋能政治”, 而且注重“用政治引领计算”。在议题拓展上, 计算政治学需要围绕数字主权、数字国家、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未来, 计算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形成紧密的学科共同体, 促进学科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有机结合, 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计算政治学; 政治学学科; 方法论创新; 共同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249 (2026) 01-0098-12

DOI:10.20200/j.cnki.gjxdh.2026.01.003

在2024年新公布的政治学学科目录中, 计算政治学是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计算政治学出现的背景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宏观背景紧密相关。作为政治学的新兴二级学科, 计算政治学需要如何发展才能够建立自己稳固的学科基础,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就其名称而言, 计算政治学本身需要有非常强的方法论创新。同时, 一个新兴的二级学科同样需要在议题上回应重大事件。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过程中, 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就成为计算政治学探讨和解决的领域。并且, 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要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还需要在共同体建设上持续发力。笔者将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以对计算政治学的整体发展给出一种宏观图景的描绘与展望。

## 一、计算政治学: 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计算政治学要放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理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在数字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对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蓝图进行了描绘。<sup>①</sup> 数字中国建设的展开, 成为各学科理论发展的新增长点。计算政治学

作者简介: 高奇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sup>①</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中国政府网, 2023年2月27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2025年5月5日。

是政治学响应这一国家战略的学科发展努力。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之一，需要直接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学科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需要各个基础学科的支持，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规划》中。《规划》指出，在数字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要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思维，明确要求要布局一批数字领域的学科专业点，同时在此基础上围绕数字领域培养相应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规划》还鼓励高校、研究机构等积极参与数字中国建设，建立一批数字中国研究基地。换言之，数字中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政治学需要作为一个单元参与数字中国的整体性建设。政治学一方面需要围绕数字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在相应的研究领域进行布局。

第二，政治学的学科特性使其在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的过程中独具独特性。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宏观，包括国家、社会、政府、政党等宏观层面的组织现象。就数字中国建设的具体内容来看，有一些与政治学直接相关。例如，在“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部分，《规划》指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文明。其中，涉及数字政务建设的规章制度、数字化能力建设、数字化服务水平等都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密切相关。在数字政务之外，数字经济问题同样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紧密相关。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反垄断问题，就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切入，这样才能够理解在数字化进程中，国家需要依赖关键的科技企业来推动数字化，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身数字能力。此外，政治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与数字文化的探讨也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无论是关于网络文化的研究，还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都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有密切关系。数字社会的建设同样离不开政治学。尽管数字社会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议题，然而，在数字社会建设中，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乡村发展和治理等议题都与政治学研究紧密交织。如前所述，政治学的视野更加宏观，其可以与社会学的研究相互补充，从不同的视角对数字社会的问题展开相互印证和启发的研究。在数字生态文明推进过程中，同样也需要政治学的参与。在政治学的发展中，已经产生了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的相应成果，而数字生态文明则是与这一领域相交叉的内容。

如何对新出现的这一领域进行命名至关重要。一个合适的名称会对这样一个二级学科或领域的发展起到一种向心的作用。实际上，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新的学科目录之前，对于这一新的交叉领域进行命名，其实有诸多备选方案，包括计算政治学、科技政治学、智能政治学、数字政治学、技术政治学等。

这些备选方案都有各自的名称优势。计算政治学是计算社会科学在政治学中的延伸。计算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是，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都作为一种计算，其主要是在量化逻辑的基础之上展开的。<sup>①</sup>因此，计算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切皆可量化。在量化和操作化的基础之上，

<sup>①</sup> 李锋、王浦劬：《计算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2期。

其尽可能地将一切问题化归为计算问题。计算政治学则更多是将政治学中的经典议题如国家、政党、革命、社会运动、民主等概念做进一步量化。在量化的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计算政治学的优势在于，其更加强调以量化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科技政治学的外延明显要大于计算政治学，因此，科技政治学的优势在于其不仅可以将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政治问题涵盖进来，还可以包含与其他科学技术相关的政治问题。例如，近年来日益显著的科技政治化、科技冷战、科技价值观联盟、太空政治、碳中和政治等。

智能政治学的外延较小，同时智能也反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核心特征。然而，智能政治学表达得过于具体，能够涵盖的对象相对较少。并且，智能是一项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尽管在 ChatGPT 的技术爆发之后，人工智能似乎有了较大的进展，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工智能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智能政治学略有超前。相比而言，数字政治学可以包含智能政治学的内容。同时，数字技术范围更广，不仅包括人工智能，还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量子计算、元宇宙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因此，可以将智能政治学视为计算政治学下面的一个更小的分支。

技术政治学是技术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其早期发展主要由国外的研究推动，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关于技术与时间的讨论，就是技术哲学的重要范例。<sup>①</sup> 技术哲学本身隶属于科技哲学，更加关注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技术政治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与科技政治学会形成一些交叉。同时，技术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沿袭技术哲学的强批判传统，如就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政治学更多蕴含了强批判的内涵，其建设性的意义相对较弱。

## 二、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创新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方法论的引入。政治学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例如，早期的政治学研究更多从政治哲学的思辨入手，这构成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另外，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往往会从具体历史或具体案例出发，进行单个案例分析或者多案例比较。在定量研究兴起之后，根据已有的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之后，还出现了定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是传统结构分析（理论分析）的精细化。<sup>②</sup> 定性比较分析则是运用布尔代数中的真值表方法对定性判断再做进一步的计量化。然而，在今天数字革命的背景之下，引入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新方法就变得至关重要。

计算政治学的计算是一种“大计算”。之前在政治学中使用的定量方法往往是基于所选样

<sup>①</sup>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I: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6-17.

<sup>②</sup> 黄杰：《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本的小数据分析，是一种“小计算”，而计算政治学所强调的计算是一种全量计算。具体而言，需要引入的方法包括：其一，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方法。预测分析在之前的政治学研究中极为少见。预测的前提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在之前的政治学研究中，数据积累本身不够，因此很难做预测。然而，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性。例如，谷歌的 GDELT 数据是一个基于几十年的新闻文本编码后形成的大数据集。研究者可以基于 GDELT 的历史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如长短期记忆（LSTM）<sup>①</sup>、转换器（Transformer）、Informer 等来对未来走向进行预测。其二，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大语言模型方法。政治学研究中涉及大量文本，如政策辩论、政策文本等。之前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已经在使用 Nvivo 工具对文本进行手工编码或 LDA 主题建模。<sup>②</sup>而计算机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则可以帮助我们做更深入的自动编码以及情感分析等。例如，一些研究使用 BERT（包括 ALBERT 等）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sup>③</sup>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是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之上实现的，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如何运用大语言模型。譬如，在一些开源的基础模型上是否可以微调出政治学类的大模型？此外，要提高知识检索的水平，还需要将大语言模型与知识图谱结合起来。这些方法都可以成为未来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其三，多模态分析与微表情分析。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基于文本以及一些结构化数据。然而，在现实中，还存在大量非文本的非结构化数据（如视频、语音资料），这些都是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较为忽视的数据来源。从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角度来看，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正在从大语言模型向多模态大模型转变。许多方法都指向跨模态对齐。这样的方法同样可以被用到计算政治学的新方法探索中。总之，计算政治学的研究需要引入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各种新方法。

第二，工程能力和工程思维。科学与工程是有区别的。科学更加强调因果关系，而工程则强调通过搭建一定的系统来直接解决实际问题。计算政治学不仅需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需要到工程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力，才能够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可以搭建一个动态实时感知和分析的数据系统。这需要几方面的集成。首先，需要有强大的数据集成能力，即能将不同来源和结构的数据整合成统一的数据模型。其次，还要具备一定的流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快速响应并进行实时分析。再次，还要引入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特别是在预测方面的模型），并且增加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继而，可以将解释结果与可视化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通过联邦学习、同态加密等方法保护数据安全。最终，这样的系统需要以一种交互式仪表盘的方式来呈现，并且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查询的功能直接进行更加便利的交互。

再如，可以通过多智能体的智能仿真系统来进行政策模拟。首先，相关主体可以基于不

- 
- ① Bingnan Wang, "Big Data-Based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Vol.4, No.7, 2022, pp.16-23.
  - ② Anna Malandrino, "Compar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Methods in Combination with Document-Bas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Understand Policy Networks," *Quality & Quantity*, Vol.58, No.3, 2024, pp.2543-2570.
  - ③ Joan C. Timoneda, Sebastián Vallejo Vera, "BERT, RoBERTa, or DeBERTa? Comparing Performance Across Transformers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Tex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7, No.1, 2025, pp.347-364.

同的智能体进行建模。不同的智能体代表不同的角色。在交互和策略互动之中形成新的博弈方案。<sup>①</sup>其次，如果模拟的智能体数量较多，那就涉及分布式计算和GPU加速。再次，还需要系统动态地调整模型参数，并实时反映一些具体变化。最后，如果要达到较好的可视化效果，还要进行实时渲染和交互式仪表盘的设计。

第三，传统政治学方法的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还需要面对那些还未发生但有可能即将发生的重要问题。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极快，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和整个政治格局的变革。例如，伴随着ChatGPT的技术演进，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加速到来，这将可能使人类社会产生失业、失序和失控三类风险。<sup>②</sup>然而，这些问题很多还未发生，缺少经验的事实或数据，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便不可行。但是，这类问题又极为重要，需要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有两类研究方法可能有效。一是探索性思辨。我们可以尝试在政治哲学观点的基础之上，对正在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前瞻性的预判。二是想象性叙事。目前的叙事更多是在实证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即用叙事的逻辑将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一种构造。然而，在研究尚未发生的数字化未来时，我们可能要更多采用一种想象性的叙事。这里的想象性叙事并非科幻小说式的虚构，而是一种基于未来现实主义的叙事。

之所以要进行这些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因为我们需要面对正在快速到来的未来。之所以强调这种未来的快速到来，是因为技术的加速。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未来缺乏相应的思考和工具，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恐怖的未来。当然，面对未来，我们又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工具。因此，一种较好的方法是基于历史和当下来讨论未来。这样的未来可以被称之为一种效果未来。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讨论中提出了效果历史的观点，即人类往往基于某种效果来重新构筑历史。<sup>③</sup>在笔者看来，我们同样要实现一种效果未来，即基于未来的理想目标来构筑未来。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拥抱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将计算学科的大量知识导入进来，并且增加工程思维，另一方面还要对人文方法进行创新。通过方法的创新，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要体现一种“文”“工”结合的特点。具体而言，我们不仅要将在工科的方法导入进来，还需要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进行人文精神的创新。人文方法也需要产生一些新的方法论，特别是政治哲学在其中的作用会更加重要。计算政治学这样的名称表明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方法论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其本身需要有更多的方法论创新。这样的方法论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引入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而是要在将其引进之后进行新的自我革命。只有诞生更多、更强大的新方法论，这样一个二级学科的地位才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① Zhang Kaiqing, Yang Zhuoran, and Tamer Başar,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 Selective Overview of Theories and Algorithms," in Kyriakos G. Vamvoudakis, Yan Wan, Frank L. Lewis, and Derya Cansever (eds.), *Handbook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Control*, Cham: Springer, 2021, pp.321-384.

② 高奇琦：《GPT技术的全球治理方案：一个技术多边主义的框架》，《当代世界》2023年第5期。

③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299.

### 三、计算政治学的议题拓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政治学的发展需要进行议题拓展。换言之，计算政治学不仅需要“用计算赋能政治”，即将计算机科学的方法引入进来，用其研究传统政治学问题，而且需要“用政治引领计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用政治学的研究训练和积累去研究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可以大大拓展计算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同时也可以将计算政治学的内涵拓展到更为广大的数字革命场域。计算政治学的展开可能需要围绕如下议题：

第一，数字主权。主权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近代政治学的开端恰恰是围绕着主权这一概念展开的，代表性学者包括霍布斯、布丹、卢梭等。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传统的主权会面临哪些挑战？主权的形式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就自然成为关键性问题。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网络主权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对数字主权的研究是对网络主权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主要涵盖以下几类问题。其一，数字主权是国家竞争的新领域。例如，目前元宇宙和大模型成为数字化的热点领域，相关的主权问题随之产生。对于那些自己的民族企业并不能完全独立开发元宇宙或大模型的国家而言，主权问题就会变得日益显著，伴随着诸如这样的大模型是谁的大模型、所在国家是否可以对这些大模型进行有效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其二，数字主权与智能体的发展相关联。目前，ChatGPT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意识的特征。因此，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很可能会进一步产生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sup>①</sup>数字主权同样包含机器人主权的问题。换言之，智能体会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机器人主权会成为数字主权的一个构成部分。无疑，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机器人主权是否会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挑战？或者，是否会对人类的自主性形成挑战？

第二，数字国家。数字化对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数字化转型中，国家能力会增强还是削弱？一种观点认为，治理的关键是数据和信息，而国家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掌握，似乎可以增加治理能力。然而，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并不完全掌握相应的能力。例如，互联网平台在相应的人才储备、前沿技术的理解等方面要远远高于国家，而国家在应对数字技术方面更多是一种被动性的反应。笔者就相关的问题曾经做过探索性的讨论。<sup>②</sup>其二，未来数字国家的形式。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讨论，如比特币的发展在创造一种虚拟意义的国家“比特国”。然而，在各国对比特币相对包容的时期内，这样的比特国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在各主权国家对比特币的监管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之下，这样的比特国似乎就会分崩离析。这里就产生了传统国家权力与数字权力之间博弈的问题。比特币的出现，就是对传统国家主权的反抗。当然，国家也会通过自身的数字化来进一步吸纳数字权力。例如，数字货币的发行就是典型的国家对外部数字权力的吸纳。那么，国家在进一步推动

<sup>①</sup> Scott Pelley, “‘Godfath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offrey Hinton on the Promise, Risks of Advanced AI,” CBS News, 2024-06-16, <https://www.cbsnews.com/news/geoffrey-hinton-ai-dangers-60-minutes-transcript/>, 2025-05-05.

<sup>②</sup> 高奇琦：《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数字化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一种数字形式的国家？换言之，国家的发展是否会与未来的数字空间进行紧密的结合？或者说，国家是否会反映出物理意义的国家和数字意义的国家的一体两面的形态？

第三，数字政党。其中主要涉及如下几类问题。其一，政党在数字化进程中是否会出现衰落？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便一直面临政党衰落的问题。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政党衰落的趋势似乎在加剧。年轻人更愿意加入各类社会团体，而可能会选择逃避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政党作为西方选举动员工具的功能在进一步减弱。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西方政党是否会衰落，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二，未来政党的组织架构是否需要调整，或者其是否会与数字形式相结合？这一点在国内外都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例如，西方的政党会更多地运用各类数字化的形式进行组织和动员。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建设的过程中也会充分地运用各类数字化手段。然而，组织架构涉及政党建设中最重要内容。因此，数字化对政党组织架构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其三，数字化进程对政党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何种影响？从西方现有的情况来看，数字化无疑会加剧碎片化，为应对碎片化的社会，政治会日益表现出一体化的特征，这就使得一些极化的观点更容易被展现出来。换言之，数字化进程很可能会使得西方政党更加偏向于极化的意识形态。当然，政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集聚，恰恰是要发挥整合各方观念的功能。西方的政党在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也会进行相应调整，这同样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第四，数字政府。公共管理学科已经出现大量关于数字政府的研究。政府同样是政治学关心的核心概念。公共管理学科和政治学对政府的研究侧重点不完全相同。相比而言，政治学的研究更加宏观，多集中在两大类问题。其一，政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这实际上关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是数字技术更主要的掌握者，因而绝大多数创新都需要在某种监管沙盒的空间内展开。政府监管与数字创新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调节者和中间人，需要避免数字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另一方面，创新恰恰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监管缺位，或者说，创新更容易在弱监管的背景下产生。因此，政府在数字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这是进行数字政府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过强的监管或者完全缺失的监管都不利于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其二，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会演变为何种形式？目前数字化已经在推动政务服务的流程再造。例如，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推动的“出生一件事”，就是将公民在孩子出生之后需要办理的各项事务相对集中在一起，并可以使之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办理，这就是一种流程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数字政府可能会呈现出更多的移动化或者流动化的特征。如何对这些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就成为重要的学术问题。

第五，数字冲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冲突的增加。这主要会出现三类重要的问题。其一，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之下，冲突或社会运动将会以何种形式来呈现？换言之，

数字技术将如何服务于反抗性运动？目前已经有一些相关研究。例如，在讨论社会运动或民主化的过程中，一些社交媒体软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是一种在更加广域的空间中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工具。当然，在政府监管下，行动者如何通过一些隐秘的网络（例如手工建立的信息网络）来进行社会动员同样是新的问题。其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减少社会冲突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换言之，数字技术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冲突的减压阀。例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之后，可能就不太会诉诸某种社会运动。当然，这种社会宣泄也有可能引起共鸣，产生更大的社会运动，这其中存在某种悖谬关系。

第六，数字民主。主要围绕如下一些问题展开。其一，数字技术对民主的影响。作为民主重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更多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启动并逐步展开的。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对民主的内涵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运用脸书上用户的日常数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为特朗普当选提供了重要支持。<sup>①</sup>那么，在数字化条件下，代议制民主会发生哪些变化？代议制民主是否面临衰落的风险？其二，未来数字民主会呈现出哪些形式？直接民主是否会成为未来数字民主的最关键的内涵？当民主在元宇宙等新的空间中展开时，与传统的民主有哪些不同？总之，数字技术为民主展开提供了新的形式，但这究竟是民主内涵的深化还是民主的异化，我们尚不得而知。然而，伴随着年轻一代（特别是Z世代）作为数字化原住民的出现，新型的政治动员不得不依赖这些数字化条件。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数字技术，民主的内涵将不得不在这些新的场景内展开。

第七，数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直是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当人们将关注的重点从线下转到线上，数字民族主义便应运而生。而这一议题可能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其一，数字民族主义的新形式。数字民族主义仅仅是传统民族主义的线上表达，还是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涵？<sup>②</sup>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如何运用数字化手段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数字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否蕴含着一些新的风险？其二，数字民族主义与数字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变种。民主强调公民的自主表达，民族主义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而这两点进一步发展就会走向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政治精英利用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关心，从而产生一种看似民主但实质非民主的整体动员。如何在数字化进程中有效地辨别数字民族主义和数字民粹主义，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八，数字劳动、资本与政治经济学。劳动和资本是马克思讨论的经典议题。在数字时代，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例如，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数字劳动会变得日益普遍，然而这产生了一个巨大争论，即数字劳动是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加剧了剥削。例如，克里斯

① Paul Lewis, Paul Hilder, "Leaked: Cambridge Analytica's Blueprint for Trump Victory," *The Guardian*, 2018-03-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mar/23/leaked-cambridge-analyticas-blueprint-for-trump-victory>, 2025-05-05.

② Sabina Mihelj, César Jiménez-Martínez, "Digital Nationalism: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in the Rise of 'New'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27, No.2, 2021, pp.331-346.

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up>①</sup>另外，这一问题还与资本问题结合在一起，即数字劳动是否变成了资本的工具。资本问题还与反垄断问题结合在一起。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反垄断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即政府在推动数字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如果国家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资本的活动，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反垄断，然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减缓数字化的进程。政府要有效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并走到世界科技革命的最前沿，则需要依赖那些更具创新力的企业。这些企业要获得原始创新就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因此，如何处理与资本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允许资本过度地追求垄断并在强剥削的基础之上占有公民的数字劳动，也要获得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动权，因此，我们需要鼓励企业在法治条件下，以资本为工具进行科技创新。

第九，全球数字治理。这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例如，区块链是一种智能合约的机制，可以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高度不确定性注入某些确定性。通过智能合约机制能将相关的约定锁定在某些条件之上，一旦条件具备，合约便会自动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字技术会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再如，相关主体可以在区块链基础之上尝试构造全球数字货币，为全球治理提供进一步的合法性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数字化相关内容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例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安，在好莱坞已经出现了60多年历史上首次全行业罢工。<sup>②</sup>如果此类问题进一步蔓延，就需要在联合国层面启动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多次强调要启动相关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的内容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内容。

总之，深度的数字化使得政治学研究的相关议题不断拓展。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只有在不断回应这些新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增加新的学科知识，并构成计算政治学的新增长点。通过议题拓展，计算政治学可以更加有效地回应这些重大实践议题，从而产生更多的基础理论。换言之，计算政治学不能仅仅发展为一个基于方法论的二级学科，而应该成为一个既有新方法论支撑也有广阔议题的新兴二级学科。同时，只有在基础理论的支撑下，才能够培育视野更加开阔和具备强大生命力的二级学科。

#### 四、计算政治学的共同体建设

计算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聚焦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学科的内生建设，即要建立计算政治学自身的学科共同体。这涉及计算政治学与政治学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根据新的学科

<sup>①</sup>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243-282.

<sup>②</sup> Angela Watercutter, "The Hollywood Strikes Stopped AI from Taking Your Job. But for How Long?," *Wired*, 2023-12-25, <https://www.wired.com/story/hollywood-saved-your-job-from-ai-2023-will-it-last/>, 2025-05-05.

目录, 政治学下设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计算政治学十个二级学科。伴随着国家数字化进程的深化, 计算政治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这一学科也可以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专业的数字化人才, 并有效地支撑数字中国的建设。当然, 在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中, 还要纳入政治学其他二级学科中的一些基础知识。例如, 计算政治学的展开既需要掌握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 同时还要具有比较视野(如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知识)和全球视野(如相关的国际政治或全球治理知识)。

另一方面, 学科建设还需要与外部保持开放的联系。要将学科内生建设与外部开放交流相结合, 这样才能够形成更大的外溢效应或扩散效应。目前整个社会科学都在进行重构。计算社会科学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因此, 计算政治学面临的问题, 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社会科学中。通过这种外溢式的讨论, 计算政治学的研究不但可以激发更多对基础问题的思考, 也有助于将计算政治学的成果向学科外扩展。计算法学、计算社会学、计算新闻学等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在计算政治学的发展中同样可以借鉴。当某个具体问题出现时, 问题本身并没有学科属性。学科是研究者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以及自己更多的关注点逐渐形成的。因此在研究中, 研究者既要有自己的学科意识, 同时还要有打破学科边界的意识。只有与计算相关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形成密切交叉并取长补短, 才能够进一步推动计算政治学的发展。作为一个新兴的二级交叉学科, 计算政治学一定要在政治学内部以及政治学外部都保持足够的开放性, 更多地回应数字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才能够产出有价值的成果, 最终才能够为政治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这种跨学科讨论甚至会对计算机学科这样的工科产生影响。大模型能力的快速提升(特别是在自动编程领域有巨大突破), 将给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因而, 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同样需要进一步拓展边界, 并回应重大社会问题。而政治学本身就有—个非常广阔的问题领域。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研究者进入政治学学科领域, 这样的大交叉和大交流可以产生更多的重要议题和成果。通过与工科研究者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甚至是进一步合作, 有助于政治学研究产出更具创新力的成果。因此, 这种学术共同体一定是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充分结合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够以更先进的方法论, 回应更多的社会重大问题, 并推动计算政治学自身更为积极的发展。

具体而言, 逐步推动计算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可以在以下方面发力:

第一, 相关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论文是学者成果的最常见形式。在一个学科领域的形成过程中, 一些代表性论文可以起到重要的引导效果。代表性学者可以在期刊上形成专题文章或在论文的基础之上形成相应著作。这些成果会起到“奇异吸引子”的作用, 吸引大家把关注点聚焦在计算政治学。

第二, 学术会议。学术会议往往是共同体的开端。论文的发表多是学者个人或少数学者所

为，而学术会议则往往会形成几十人之间的交流，可以将政治学学科内的相关研究者聚集在一起，进一步凝聚共识。这样的学术会议讨论有助于形成学科的初步边界与共识，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框架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会进一步激发议题的拓展。在讨论中，一些新的观点以及新的议题会自然产生。

第三，专业委员会。随着相关学术会议的多次举办，学术共同体将逐步产生意识自觉。此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可适时申请在正式学会下面设立相关的分会或专业委员会。例如，可以考虑在中国政治学会下设计算政治学的二级学会或专业委员会。这种专业委员会的设立，实际上是学术会议的一种定期版本，有助于共同努力的组织化。一旦形成专业委员会之后，相应活动就会变成定期的组织化活动，使得科研向“有组织的科研”方向发展。

第四，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关乎学科的长远发展。学术论文和著作更多地面向研究者，而如何将计算政治学的知识转化为普通的学习者甚至是社会大众可以轻松阅读的教材，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同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如何将一些基础的政治学知识与数字领域的相关内容结合，并以更加通俗化的方式传递给本科生以及社会大众，都是未来需要持续探究的重要议题。换言之，计算政治学人才的培养是该二级学科长久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基本生命力所在。

## 五、结语

目前，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规划的推出，这个进程不仅具有民间驱动的强大自发动力，而且带有很强的国家力量推动的要求。这需要政治学更加积极地回应这种要求。因此，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计算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就会变成题中应有之义。整体来看，计算政治学要取得较大的发展，不仅要引入计算机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方法论，还需要在这些已有方法基础上进行自身的方法论创新。在计算政治学的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不仅要引入计算机科学的知识，还要进一步具备工程思维，通过搭建一些工程化的界面和系统来有效回应实际问题，并逐步推动计算政治学走向预测科学。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焕发人文精神，创新自身的方法论。计算政治学需要有非常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创新是计算政治学的“立身之本”。

同时，计算政治学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不能仅仅强调方法论，还需要对研究议题作更为广阔的扩展。这不仅需要用计算机科学或智能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议题，而且需要用这些新的方法来回应数字中国建设中的更加广阔的问题领域。只有通过回应这些议题，才能够产生更重要的理论成果。同时，只有在议题拓展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理论，才能够使计算政治学拥有更为雄厚的“立身之本”。计算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形成紧密的共同体，需要通过将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充分结合在一起。计算政治学通过内部的学科建设等一系列的活动，首先有

利于建立起自己的内生凝聚力。同时，整个社会科学在回应这些新问题时都会有相似的问题，因此，计算政治学还需要与更多的文科工科展开交流与合作。此外，计算政治学的研究者还要有跳出社会科学的勇气，直接与工科（特别是计算机学科和智能学科）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只有在这种与外部充分互动的基础之上，才能更高效地接近那些复杂的计算或者智能方法论，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回应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化议题，同时也才能够产生更加有分量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最终推动计算政治学学科和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责任编辑 王京京）

##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opic Expans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Gao Qiq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is a discipline that emerge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It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hodologies, the building of engineering capacity and thinking, and the re-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not only empowers politics with computation, but also guides computation with politics. The expansion of topics in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can revolve around digital sovereignty, digital state,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o on. To promot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t is necessary to foster a close academic community of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with external exchanges.

**Key Words:** 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Disciplin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Community Building